

◀ (上接4版)

绝大多数不熟悉朱维铮的学术性格。他的目无余子的豪气和不容置辩的语气,很让不熟悉他的人受了一次惊吓。他对马一浮评价极低,认为复性书院的创办是马先生想当帝师。以我对马一浮的多年研究,当然知道他的判断缺乏足够的材料依据,但我没有发言。这次相见,我们彼此都感到更加亲近。

会议在11月5日上午结束。我应复旦中文系的邀请,11月6日下午有一场演讲。刚好与维铮同乘一趟列车,于5日下午前往上海。列车晚点,给了我们畅谈平生的机会。主要是他讲,我当听众。特别是他的特殊经历,增加了我对他的了解和理解。他可以坦白无隐地讲他身处当时的真实状况。过来者,心有定,事有因,如有过,自担承。如果当代知识界也可以有真男子之称,我想维铮当得。

11月6日下午的演讲,我以《国学与传统文化》为题,从三点讲到五点,然后有半个小时的互动。复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主持,傅杰副主任安排筹划。演讲后的晚宴,维铮携夫人出席了,并以他的新书《走出中世纪》(增订本)和《走出中世纪二集》相赠。为报答维铮一夜读竟《要略》的厚谊,回京之后,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,通读了他的两本书。不仅通读,还写了一篇文章。11月26日写完,《中华读书报》在2009年的2月11日刊出。这是一篇痛快淋漓地论述朱维铮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文章,既标示其长,又不护其短。下面摘录一段揭示其长的文字,请读者阅正。

章学诚有言曰:“高明者多独断之学,沉潜者尚考索之功。”我读维铮书看到的作者,宜乎“独断之学”胜于“考索之功”。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“高明者”。他看重思想的力量。他的学问是活学问,不是死学问。但如果有人以为他的学问根底不够坚实,那就难免犯不知人也不知学的错误。他的学问根底来自五十年如一日的文本典籍的阅读。他习惯夜里读写,上午睡眠。上帝虽未垂顾于他,却为他拨出比常人多得多的时间。疯狂阅读加上惊人的记忆力加上超强的理性分疏能力,成为朱维铮学问过程的主体精神结构。包括《中国近代学术名著》在内的他编的那些文史典籍,我们切忌以俗眼揣度,在他可是自己吞食原典资料的天赐良机。牵涉学术的理和事,他从不“尸位素餐”。如同钱锺书说“善述”不亚于“善创”,好的编选整理,与文献研究庶几近之,远非夸张篇幅的浮词空论所能比并。课堂上下,大会小会,维铮可以随时挑出时贤后生关乎古典今典以及时地人事的瑕疵舛误,就缘于他的记忆和阅读。

还有一段说:

维铮先生的学问结构,史学是其地基,经学是其屋棚四壁,近代人物是屋中暂住的过客,思想是其柱石。说开来,他所治之学主要还是思想史。他也是以此自负自居的。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,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,二则由于“高明者”的知性傲慢,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,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“中世纪”的“闲愁胡恨”。他优越地驱遣着入于他研究领域的历史人物与事件,他既不想充当历史人物的“辩护士”,也不想做历史事件的“事后诸葛亮”,但他不免相

信自己对历史的清理(他偏爱马克思的这句话),没有为后来者留下多少空地。

如果这些论断是对维铮其人其学的褒扬的话,那么我可以自信地说,是褒扬,却绝无丝毫溢美。维铮的人和学,其本来的样子就是如此。但我也没有讳言他的偏失之处。针对他对儒家思想的偏颇之见,我认为那是由于:“未能将汉以后渗入家国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儒学,和作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区分开来”,“未能将宋代的哲学家程朱和明清权力者装饰过的程朱理学区分开来”。而对他武断地否定马一浮先生,我则提出理据予以反驳,甚至提出,他也许压根就不应该写关于马一浮的文章。我说当涉及到此一方面的议题之时:“是又我爱维铮,亦不敢悉为维铮辩也。”我还谈到:“他的冷峻的语言风格,容易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,没有同情。清儒‘实事求是,无证不信’的信条,他奉为圭臬,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‘实事求是,护惜古人之苦心’,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苦心孤诣,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‘了解之同情’。”

文章刊出后,我寄了两张样报给他。三天之后我们通电话,问他收到报纸否?维铮的欣悦与欢慰,全都不加掩饰地从声音里流溢出来。他显然不仅认可而且看重我对他的评说。

然而一年之后,就传来了维铮身体欠安的消息。我想到可以做一件事。就是从他的《走出中世纪二集》里,选录专论慈禧太后的部分,刊载于《中国文化》2011年的春季号。文长两万八千字,分八个小标题:一,由咸丰

到慈禧;二,慈禧垂帘的合法性;三,胜保与慈禧;四,胜保非死不可;五,慈禧破满清惯例;六,女主慈禧;七,她是甲午战败的权首;八,帝国被慈禧终结。我跟他在电话中商定,就以最后一个小标题“帝国被慈禧终结”,作为全文的题目。刊物当年五月份出版,他收到样刊后,写来一信,在我心里,这是他写给我的最值得纪念的一封信,现抄录出来,以绘读者。

梦溪先生:贵刊春季号拜领。拙文由简体化繁体,颇烦,而贵刊的转换,据我通阅,“硬伤”约六、七处,已见校对不易。赐酬已拜领,谨呈回状。

愚体经住院八个月,尚属稳定,故医生同意出院在家服药,今已两月。在家眠食较随意,然仍不克恢复研究。目前仅日日读研究生论文,轮流同彼等商酌而已。曾尝试作文,因戒烟及体弱,效率大减,徒呼奈何而已。

再度感谢您发表拙文。专此奉达,顺候

时绥

弟 维铮 上 2011年五月二十九夜

附拙文校阅一纸,请参。

不用说当时,今天再重读此信,仍感到阵阵难过。维铮是何等强健之人,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,竟使他无法不面对已经疲弱的身心。更让人感到难过的是,他的凌云健笔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纵横驰骋了。但他的严谨认真一如既往,简转繁的舛误,一处不漏的校正过来。

万没有想到,这是维铮给我的最后一封信。九个月之后,他就悄然地离开了我们。

而在维铮逝世的头一年,即2011年的6月7日,我熟悉而

且欣赏的章培恒先生,已经先维铮九个月又三天离开人世。他们两位同是沪上有棱角有光泽的学者,每次接谈,都能生出快意。2001年7月10日,培恒先生邀我为复旦古典文学中心和中文系师生演讲,头天晚上的餐叙和讲后的晚宴,维铮均在座,还有贾植芳先生,相谈至洽。我和章培恒先生另有渊源,此处不能多及,仅以2001年我写给他的一封信,略寄怀思之微意。

培恒教授文史宗席:此次在沪蒙细心款待,高谊厚情,实难忘也。而酷暑炎天,迎立于庠门之外,尤感惶愧无地。幸理趣契合,默然对座,亦有道存焉。又得维铮侠士快言快论,学问之乐,尽在其中矣。世间缘法,十年一觉,非人力所能设计。日前诵读文汇报周报上先生论《金庸招不到博士生以后》大文,体情之厚,哲理之密,宅心之宽,近二十年之理辨文字未能有也。查先生固因之去掉诬枉,世道学风亦为之一洗。甚佩,甚佩。内子祖芬亦大赞好文章。已复印寄京中诸师友。中心编《中国文学研究》一至三辑已拜收,谈蓓芳女士研究古代文学对二十世纪文学之影响,颇见工力,请并致劳烦之谢意。不备,即祈暑安文吉。

梦溪拜上 2001年八月五日
章先生知道我和维铮情近,每次见面,他都约上维铮。这封信里,我称维铮为侠士,是为不经意的以心相许,然则就同此为念可也。

2012年4月写就开头之一节,2020年3月20日增补重写于京城之东塾

(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)

朱迪斯·巴特勒谈非暴力

美国哲学家朱迪斯·巴特勒的新书《非暴力的力量》(Verso, 2020)近日出版。去年12月,哈佛大学非洲与非裔美国人研究学者布兰登·特里(Brandon M. Terry)对巴特勒进行了访谈。本刊编译巴特勒的部分回应如下。

道德论证容易将非暴力想象成个体决定是否要参与暴力行为,比如打人、使用工具或枪支等伤人,然而暴力的形式并不仅限于单纯的一击。有的暴力形式并不需要击打他人。迈克尔·福柯辨别出了主权暴力的形式,即一位君主得以决定人的生死。还有一种形式的暴力,福柯称之为生命政治,喀麦隆哲学家 Achille Mbembé 称之为墓地政治;这种暴力致使一群人死亡,将他们抛弃,或拒绝向他们提供能挽救生命的帮助。

在美国,非裔和拉丁裔民众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暴力和死亡。也许并没有人用棍子敲打他们,也没

有人朝他们头部开枪,然而一种结构性暴力正在发挥作用,这种暴力将人命划分出贵贱,有些人值得保护,有些人则不值得。

在当下的语境中,我试图弄清的问题是,为什么有些行为会被称为暴力,明明没有任何经验性、视觉性或实证性的东西可以证明。一个趴在地上的黑人男子,一个跑开的黑人男子,又或者一个被完全锁喉的黑人男子,如何还能对警察的生命构成威胁,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。我想说的是,趴着、跑着、被锁喉,这些就是黑人身体的主要状态,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状态则是麻痹、恐吓及恐惧。可以说,这其中任何

一种状态都不会构成威胁,却被人臆断为迫在眉睫的危险。人们生活在某种种族主义的恐慌想象中。

对于其他生物,以及更广义的生命进程,如果我自认为与它们息息相关,就必须明白,如果我摧毁了其他人,或者摧毁了某一套生命进程,那么我也就摧毁了一部分自身,因为我自己并不仅是有限和独立的自我意识,而是一系列的关系。倘若少了各种关系的维系,没有人能够存活下去。这种观点或许会让狂热的个人主义者大为恼火,个人主义者认为个人完全可以自给自足,然而这种观点是有害的。通过气候变化与全球化我们已经了解到,整个地球息息相关。我们需要树立一种新的地球观,承认、肯定并强化这种相依性,并且要明确所有生物对地球的依赖都是同等的。我们应当致力于所有生物之间平等依赖。因此在我看来,平等的概念并不是“两个个体之间的平等”,尽管有时需要采取这种说法,在政策制定上也参

照这种说法。

我不像很多西方古典哲学家那样强调平静的美德。我并不反对平静,对生活泰然处之是好事。我只是不认为它是非暴力的基础。这个世界上演的不公,不论是整体的还是局部的,每一天都在激怒我们。问题在于:应该如何对待这种愤怒?

我们很少考虑这个问题,因为我们认为愤怒是一种冲动情绪,难以控制。然而,人们专门制造愤怒,培养愤怒。不仅是个人,团体与艺术家也始终在制造愤怒。我们需要愤怒的艺术行为,在揭发和反抗暴力的同时,却不至于陷入暴力,不复制系统性或机构性暴力。就我而言,底线在于,如果我摧毁了其他生命,即等于某种程度的自毁。当人们相互攻击,其实是在切断联系我们的社会纽带。我认为,我们应培养一种社会精神,足以支撑更广阔的全局哲学观和政治观,争取实现彻底的平等,并且承认所有生命都具有平等的价值。

人类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是棘手而困难的,即便恋爱关系也充满矛盾情绪。每一种关系都有破裂的可能。我不赞成人们为达心灵的平静,而不去与我们的愤怒、我们的破坏性、甚至谋杀的冲动抗争,我们应当接受所有这些情绪。很多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大发雷霆,充满破坏欲。问题在于:在这些时刻,我们应向哪些群体寻求帮助,才能避免暴力的重演和加剧?我认为,维护敌人的生命也是在维护你想要争取的世界,在那个世界里,暴力没有加剧,而是得到缓和。因此,一切都是为了这样一个世界,为了一种复杂的社会联系,这种联系是充满热情的,喜悦而美好,当然也会具有破坏性,令人害怕。我的这一观点源自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,我认为法农也同意这一点。与他人的关系既可以抬高我们,亦可以贬低我们,我们必须自己把握。我认为,维护生命应该是集体行为,我对个人英雄主义不感兴趣。

(编译/张文婧)